

# 田中奏摺真偽是學術問題

張力／台北市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）

最近兩週「時論廣場」上有關「田中奏摺」真偽問題的討論，並非如劉廣定教授所言，模糊了主要問題。因為懷疑奏摺不存在的人士，並未否認日本侵華的事實，也相信日本早有對外擴張的計畫。問題爭論的焦點在於到底有名為「田中奏摺」的這份文件。由於所謂的「奏摺」，赤裸裸揭露日本征服全世界的一步步計畫，是否有此文件，當時就引起世界主要國家的關切。其後對此問題重視者，也不只是中日兩國學者，因為這是一個國際史上的大問題。筆者只是好奇，為什麼過去國內言之鑿鑿的鐵證，外國學者經過檢討後，並未當成一回事；即使提及，最多是說「中國方面有此一說」，實際無意採信。若說提出疑點的中外學

者是受日方說詞影響，那麼為何日本學者的論證較具說服力？筆者另外一個願望，是想讓蔡智堪家屬理解，「奏摺」真偽是一個討論已久學術問題，且目前仍在爭辯之中。若考慮對懷疑者訴諸法律，並不恰當。

運用個人回憶作為主要證據，原有其侷限性，何況蔡智堪與王家楨兩人的回憶，本身就存在若干矛盾；再加上如此重要的「奏摺」中，竟有一些敘事錯誤，也還未得到合理的解釋，因此各方不斷的質疑，是可以預期的。程玉鳳教授雖然引述了沈予之文，認為「應以當事人的陳述較為可信」，但她卻忽略了沈予在結論中，也謹慎地指出「對『田中奏摺』真偽，一時還難以作出公認的最後結論。」筆者同意程教授所言「懷疑

並不足以做為否定的「證據」，但也請程教授注意，筆者至今尚未用過「否定」一詞。而在前述疑點未獲徹底澄清前，筆者寧願維持對「奏摺」的懷疑。

劉教授之文建議我們不必太強調真偽之事，也對蔡王兩人回憶矛盾之處，提出自己的解釋。筆者尊重劉教授的解釋，但還是認為探求真相是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。至於梁敬𬭚一九六四年出版的《九一八事變史述》，為何對蔡、王是否作偽不著一字，筆者的看法是：雖然蔡、王兩人的回憶均發表於梁書出版之前，但刊載王家楨回憶的《文史資料選輯》第十一輯（一九六〇年出版），封面註明「內部發行」，當時大陸以外的學者恐怕很難取得。中研院近史所收藏的此選輯，也是在一九八六年才購得。因此梁敬𬭚無法將兩篇回憶作一比對，找出其中矛盾。既然梁書同意外國學者的研究，認為「奏摺」可疑，也就無必要對蔡智堪的回憶多加著墨。

筆者認為，已有不少中外學者對「奏摺」之事提出質疑，相關的正式論文也不難找到，那麼堅信「奏摺」為真的人士，就該撰寫一篇完整的學術論文來答辯。文中不僅需要羅列過去正反各家的論點，更要以可靠的資料來源，逐條解答學者提出的疑問。這樣的論文也許不適合在「時論廣場」有限的篇幅中發表，但筆者相信，這篇論文若能通過嚴謹的學術檢驗，必定受到中外學者的矚目，也將使「奏摺」真偽之爭，終於獲得定論。而我們在講述中日關係史時，提到「田中奏摺」或直接引述其內容時，也就不會感到心虛。